



圖一 受禪台遺蹟 河南省臨潁縣繁城鎮



圖二 受禪碑原石 河南省臨潁縣繁城鎮漢獻帝廟內

# 石中的歷史謊言

## 從魏上尊號奏到吳天發神讖碑

梅韻秋

石鑄禪代大典——「繁城二碑」與曹魏篡漢

東漢建安二十五年（二二〇），雄霸朝廷的權臣曹操（一五五—二二〇）病逝，曹丕（一八七—二二六）子承父業，改元延康，繼續以魏王兼丞相的身分宰治中原，並納當朝天子獻帝（一八九—二二〇在位）的兩個女兒為妻。然而就在與漢室聯姻的同時，他也正式終結了享祚四百餘年的大漢王朝，在百官和匈奴單于等外族首領的見證下，登上今河南省臨潁縣繁城鎮的受禪臺（圖一），接下獻帝

移交的璽綬與帝號，改元黃初，建立魏朝，史稱「繁城受禪」。禮成後還在該地刻造雙碑紀事，兩碑至今仍保存在繁城受禪臺附近的漢獻帝廟中，故又名「繁城二碑」。位在廟庭西側的是〈受禪碑〉（圖二），有黃初元年（二二〇）十月廿九日紀年，銘文紀頌了曹丕接受漢帝禪位的始末；東側是無紀年的〈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圖三），一名〈勸進碑〉，所刻為相國華歆等四十六位漢朝文武官員連署勸請曹丕代漢稱帝的奏表。此表全文亦收見於劉宋裴松

之（三七二—四五一）的《三國志注》，撰寫的時間可確定是在延康元年（二二〇）十月廿七日，但刻碑的時間則應遲至黃初年間。

兩碑銘文書風相仿，均作隸體，字形方整峻美、氣度雍容，雖與漢末東京隸法一脈相承，但結字用筆實已開日後晉唐楷體的先河，有「黃初體」之稱，其在書法發展史上的意義不言而喻。不過歷來對兩碑的評價一直是毀譽參半，除了因魏隸帶有濃厚楷意、已失漢隸古風，另一方面恐怕也與後世對繁城受禪的觀感欠佳有

關。兩碑雖亟力吹捧曹丕的德行，將之比擬為聖賢在世，也不斷美化這段曹魏代漢的歷史，將之形容成古代堯舜禪讓之治的翻版，但無論在史家

眼中，或在膾炙人口的通俗小說《三國演義》的詮釋下，此一開國盛事卻純屬一場公然欺世盜名的騙局，乃是由一連串惑眾妖言與權謀詐術交織而成。

碑記中這段充滿矛盾的歷史可追溯到延康改元之初，此刻曹丕剛接任漢相，各種奇禽靈獸便傾巢而出。據報，黃龍與鳳凰分別出現了十三次，白雉、白鳩及白雀也各現身十九次。此外，又有神龜自靈芝池湧出，赤魚乍現於承露盤之中。而在河南譙縣一

地，既有九尾狐亦有黃龍現形，巧的是這個譙縣正是曹丕的家鄉。於是左中郎將李伏便趁機上表勸曹丕代漢稱帝，曹丕自稱「德薄」，不敢受命，一場猶如走馬燈般令人目不暇給的朝廷勸進活動於焉展開。在李伏之後，復有侍中辛毗等朝臣附和勸進，但亦為曹丕所拒。同年八月八日，太史丞許芝繼起上表陳請代漢，曹丕又以天下蒼生未定為由，堅辭不受，辛毗等人遂再次集體勸進，仍遭曹丕拒絕。八月十日，督軍司馬懿領著另一批臣

十月十九日，博士蘇林呈上天人感應理論勸曹丕於本月受禪亦不成，獻帝便於隔日再次下詔傳璽。接詔後的曹丕「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兩天後又將璽綬歸還。獻帝鏗而不捨，於十月廿五日第三度下詔禪位，相國華歆等三公九卿亦同步敦促曹丕受命。曹丕仍在兩天後上書推辭，華歆等遂又再次連名上表勸進，曹丕的態度始見鬆動，而後來（上尊號碑）所

刻的就是這道打動曹丕的勸進表。至十月廿八日，獻帝第四度下詔傳賢，曹丕終於首肯，並於翌日登壇踐阼為帝。

這一幕傳國大典，表面上是漢魏兩廂情願、順天應人的權位交接，在世人眼中卻不折不扣是曹家班自導自演的一齣逼宮記。而一再推位讓賢的獻帝，其實不過是個無權無勢的傀儡皇帝，在末路途窮下，只能全力配合曹丕演出上述反覆多次到令人不耐煩的「三推四讓」情節。誰知演完這場充滿虛情假意的禪讓大戲之後，曹魏猶恐無法傳信於天下萬代，又慎重其事刻石覆述，企圖以眾口鑠金、積非成是的方式弄假成真，規避篡竊的惡名。但此舉終究難以瞞天過海，像南宋金石家洪适（一一一七—一一八四）在讀過（上尊號碑）後，就忍不住出言譏嘲：

曹氏父子睥睨漢祚，非一朝一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鳩洳（虞舜），納漢二女，豐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隸

天機豈可不洩露——識緯神學與中世紀的禪讓革命

曹魏的「假禪讓、真攘奪」——即日本學者所謂的「禪讓革命」——雖難逃歷史公審，此後卻儼然引領一代風尚，成為晉唐間諸多皇朝競相抄襲的開國模式。清代史家趙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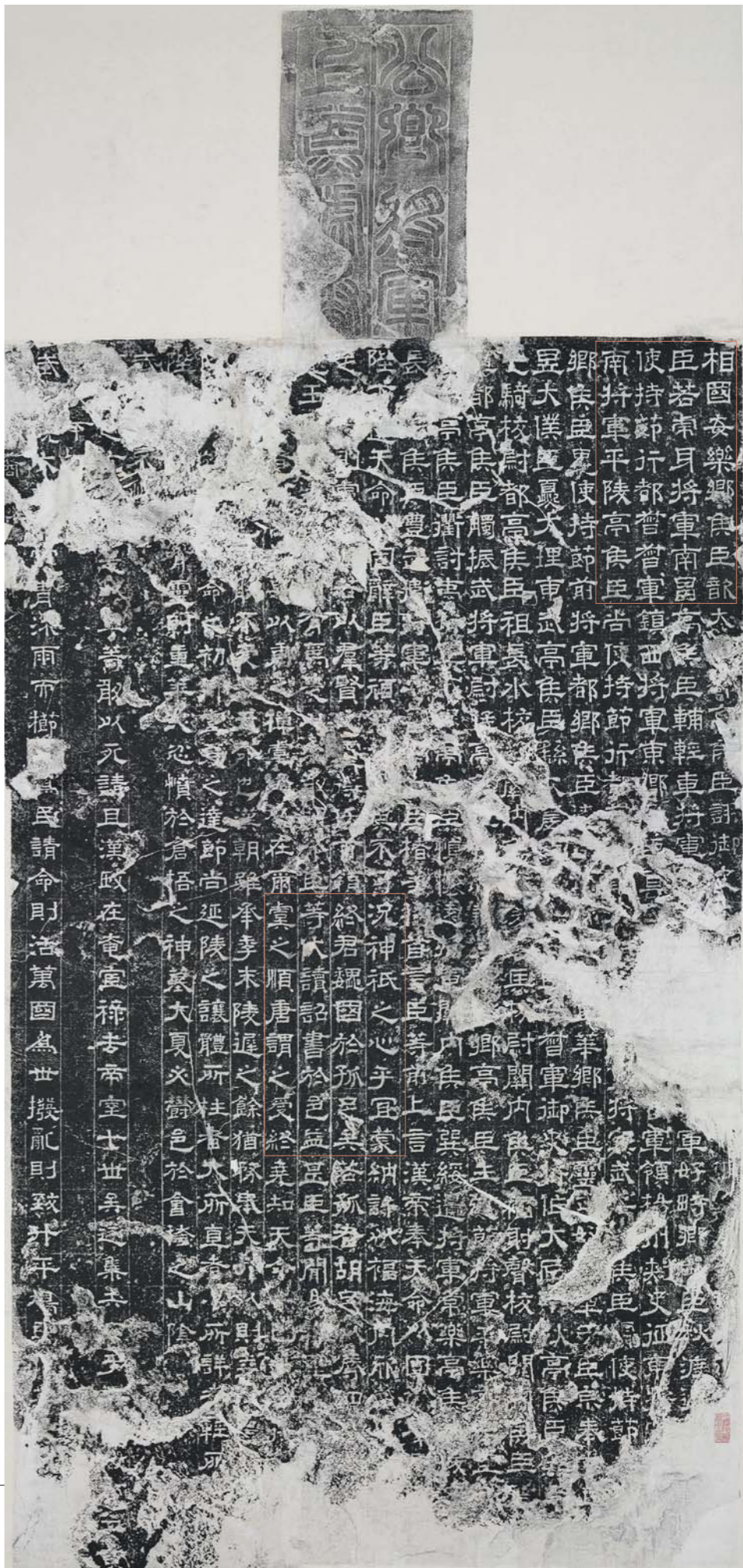
僚勸進，同樣鑽羽而歸。

非但群臣交章陳情，稍後連漢獻帝也積極投入勸進行列。十月十三日，他首度下詔讓國，遣使將璽綬移交曹丕。四日後，曹丕惶恐上章，不僅奉還璽綬，還昭告天下，表明自己「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的心跡。這道讓章一出，更叫百官心焦如焚，於是輔國將軍劉若等一百二十人隨即連名上書，疾言厲色勸曹丕莫再「固執謙虛」，否則勢將「違天逆眾」，曹丕不為所動，而眾臣也無意罷手，由輔國將軍領銜的百二十人勸進團又立刻捲土重來，但依舊是無功而返。

十月十九日，博士蘇林呈上天人



圖三 上尊號碑并額 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天發神識碑拓本 引自《書跡名品叢刊》5

個月竟高達七百餘起。假使這一切全是自然發生而非人工偽造，確實也算是一項驚人奇觀。但問題是，如何讓人相信這些異象透露的正是曹丕命當代漢的「天機」，而非另有所指呢？於是對曹魏而言，前述許芝的勸進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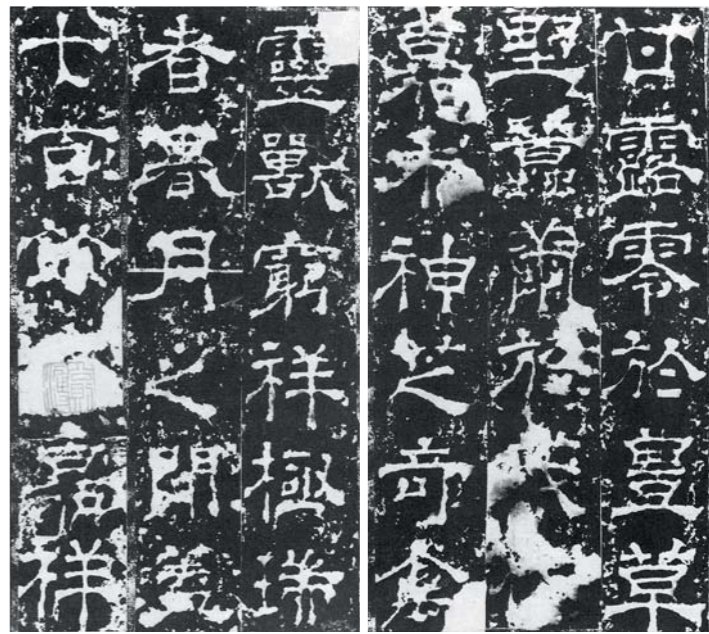
顯得格外重要。許芝非達官顯貴。他所擔任的「太史丞」一職，位階雖不高，但在有漢一代卻能興風作浪、攪動政局。小小史官，何以有此能耐？關鍵就在於他們的職掌涉及了「天機」的記錄

與解碼。上從神祕的天文星象，下至詭異的節候變化，經過他們的分析解釋，都可以是預言人間災祥、國運興衰、甚至朝代更迭的符碼，可說既是玄奧的天啓神兆，也是敏感的政治機密。除了占星觀象，東漢的太史還掌

（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在《廿二史劄記》中論及此一世紀怪現象時，也不禁要佩服曹魏這個始作俑者的創格，他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不僅如此，他甚至認為曹魏禪代雖「一切出於假偽」，但從曹操終身不敢稱帝，以及曹丕推辭十餘次、不肯遽然受禪的繁文縟禮之中，仍展

為使受禪之事看來順理成章，曹魏苦心經營的假像還不只是獻帝及群臣的踴躍勸進而已。在此之前，曹魏也不再費事將全程經過予以刻石立銘。由此觀之，繁城二碑的建造，倒是凸顯了曹魏對禪代一事步步為營的態度。

顯然，當時所有自然界的異變，全被渲染成上天示意曹丕代漢繼統的「瑞兆」，且數量之多令人咋舌，短短一



圖四 受禪碑拓本 局部 夏運居舊藏

現「揖讓之遺風」。至於代魏而興的晉朝司馬氏，也尚能步武曹氏前軌，在稱帝之前，先以宰輔身分事奉魏朝歷三世之久，準備登極時，也曾儀式性地回絕百官勸進達十餘次之多。

不過隨後的南北朝權臣，則紛紛省去這些令人夜長夢多的繁複程序，一旦掌握大局即逼主退位，迫不及待完成移祚大典，毫不遮掩自己見獵心喜、狼吞虎嚥之態。同時，對前朝末帝的處置也日趨殘暴。漢獻帝遜位後，被曹丕貶為山陽公，猶能保全性命。司馬炎代魏，貶元帝曹奂為陳留王，也未嘗加害。但自劉宋起則變本加厲，權臣奪國之後，往往立即將舊主殺害。禪代儀式演變至此，更加虛有其表，實已無異篡弒。朝廷既無心搬演君臣之間「三推四讓」的情節，也不再費事將全程經過予以刻石立銘。由此觀之，繁城二碑的建造，倒是凸顯了曹魏對禪代一事步步為營的態度。

其實早已為日後代漢之路預埋了更厲害的伏兵。這些伏兵並非凡胎俗骨，而是上文提到的龍、鳳、神龜等神話傳說中的靈物以及白子異化的飛禽走獸等。他們在曹丕甫任漢相的第一個月，便以千軍萬馬之勢蜂起於全國各地，不但成為地方熱烈報導的連續神祕事件的主角，稍後也一一被登載在繁城二碑之中，形成曹魏開國神話中不可或缺的一章。

像「上尊號碑」就稱曹丕輔漢「布政未朞」，即「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還於其間者，無不畢備」。（註二）〈受禪碑〉也強調曹丕拜相之後，「天關啓闢，四靈具臻。湧醴橫流，山見黃人；甘露零於豐草，野蠶萌於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朞月之間蓋七百」（圖四）。



圖七 啓母石關銘拓本

值得一提的是，三國時期假造神旨立國者並不只曹魏一朝，而用來傳頌這類虛構神話的刻石也不限於繁城二碑。在南方，尚有吳末帝孫皓（二四二—二八四）所造〈天發神讖碑〉（圖五）及〈禪國山碑〉（圖六）與之爭鋒。兩碑均立於天璽元年（二七六），且同是為了紀念吳國境內層出不窮的「天降符瑞」事件。這一年先是出現了幾件文字玄奧難解的刻石，孫皓曾先後派三批專員前往判

讀，但仍無法將全文釋出，從而認定這就是上天垂示的「太平文字」，並於江蘇南京樹碑紀功，此即〈天發神讖碑〉的來由。稍後在浙江陽羨山又出現一長十餘丈的裂縫，名曰「石室」，孫皓視為大瑞，甚至為此遣官至陽羨去進行象徵帝王受命平天下的封禪儀式。只是天子封禪的地點向來在泰山，非立國江南的孫皓所能企及，於是便改以陽羨縣的國山（浙江宜興離墨山）替代，並在山中建〈禪國山碑〉歌頌吳德，碑文之中洋洋灑灑鋪陳了孫吳此際發生的祥瑞事件計一千二百八十一條，較諸曹丕的一個七月百件，實不遑多讓。

**天書南降——「天璽二碑」與三國的王朝正統之爭**

進時，他其實正是拿國家神學官的權威替曹魏代漢的正當性背書。在表文中，他首先斷言「黃龍」的出現，是「帝王受命之符瑞」中最具代表性者。接著他還援引多條讖語，包括「代漢者，當塗高」、「漢以魏，魏以徵」、「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等，來證明曹魏代漢之事早就預載在緯書之中。然而，除了第一條是源自舊典，其餘恐怕全是他自行造作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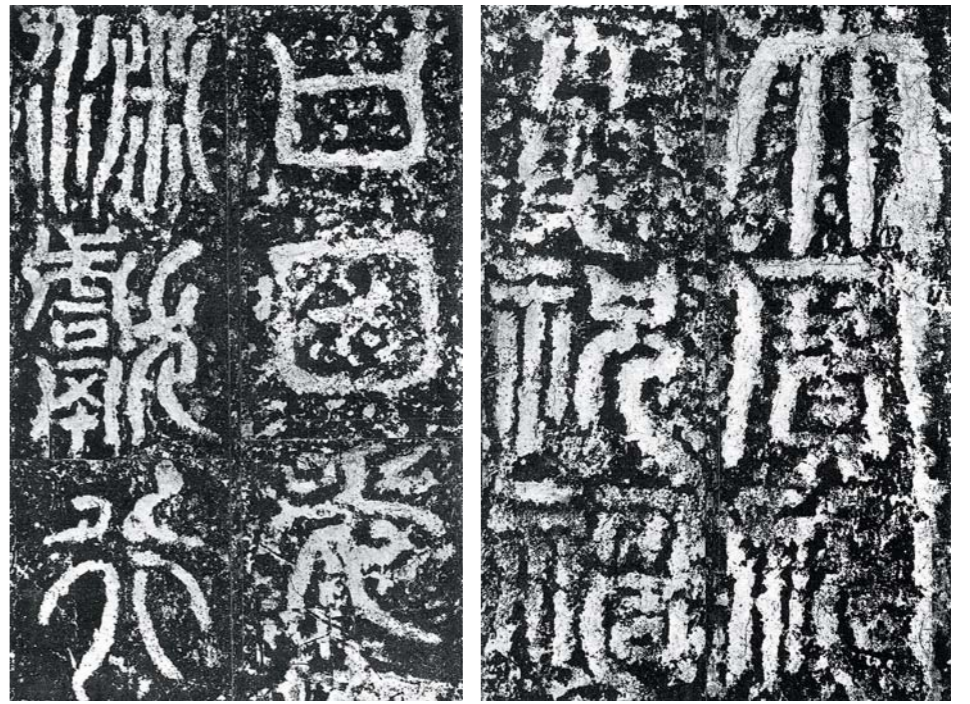
一如繁城二碑之亟力將曹丕神聖化，天璽二碑亦試圖將孫皓形塑成真命天子。但借助「受命之符」以強化皇權正統性的時機，一般多在王朝新建之初，為何孫吳卻在建國五十年後才又大舉造作符讖？據魏斌的解釋，應與此際南北政治版圖不變有關。在孫皓登基為第四代吳主的前一年（二六三），曹魏併吞蜀漢，打破了長久以來三國鼎立、相互制衡之局。

但劉秀既是借讖語之力得天下，自然深恐他人如法泡製。於是他一面將舊有讖緯編為定本，鼓勵臣民學習，一面則又禁止他們再妄自增損定本或造作新讖，否則視同謀逆。可惜此法是防的一時，防不了一世。當許芝以東漢太史的身分上表向曹丕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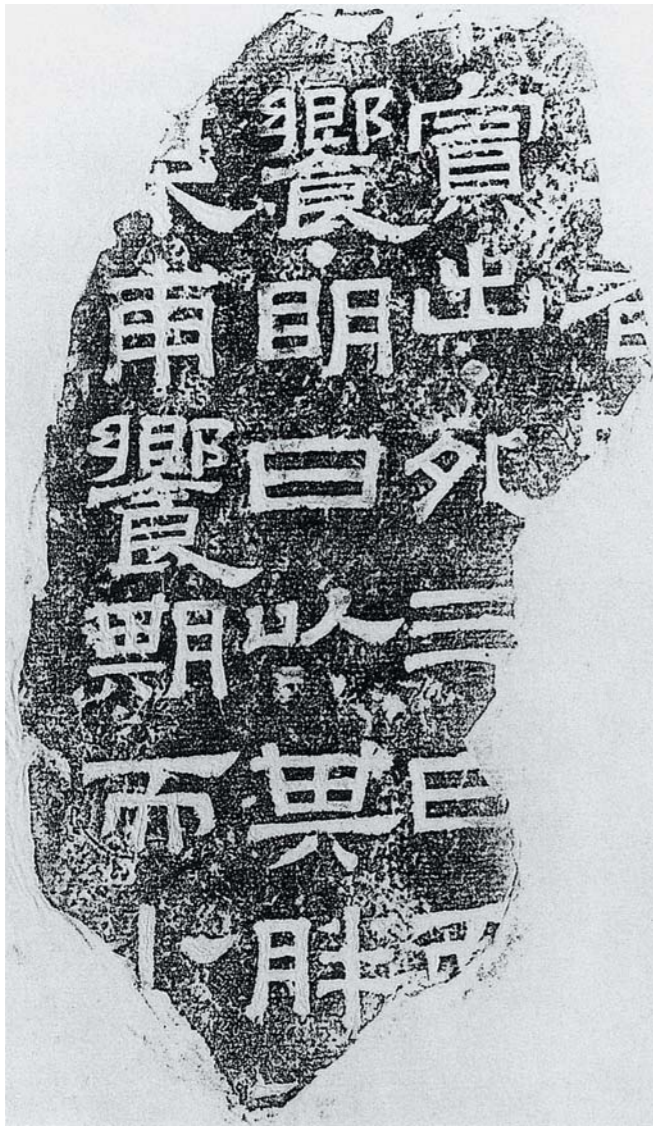
管另一項足以引發天下騷亂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當時被奉為資治寶典、奪權密笈的圖讖緯書。這些圖籍其實多半是漢代方術之士依托古經造作出來的占驗符命之書，因事涉玄秘，不足

為外人道，向有「秘經」或「內學」之稱。然而自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前六一—五七）藉讖語起兵顛覆新莽後，此學便一躍而成國家的神學正宗。劉秀不僅用人施政依賴讖緯決斷，還將

這批神學文獻修成定本公諸於世，好讓濟濟多士得以一窺堂奧。至此，讖緯不但是「干政」之具，也成了「干祿」之學，整個王朝皆籠罩在其強大的魔咒之下。



圖六 禪國山碑拓本 引自《書跡名品叢刊》5



圖十 熹平石經殘石拓本

後移至江寧府學，可惜在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燬於火，現在只能從十八世紀褚峻縮摹的《金石圖》中一窺殘影（圖八）。  
相對於不循常軌的天璽二碑，繁城二碑則處處在矩矱之中。碑體仿禮器「六瑞」中的玉圭形制，屬漢代常見的圭首長方碑（圖二、九），而書風亦是一派堂正且淵源有自。儘管對於書者為誰，歷來聚訟紛云，不過

一般均認為二碑書法應是承接《熹平石經》（圖十）而來。此套石經始造於熹平四年（一七五），成於光和六年（一八三），是漢廷為了將儒經文字標準化而刊行的官方樣版。全文僅用今隸書寫，並由當代書學權威蔡邕（一三二—一九二）主導書丹工程，刻成後樹於東京洛陽的太學供天下學子觀摹，是儒學教科書，亦是東漢官方書法的範本。這種標準化的成熟期漢

兩年後志在一統南北的晉朝代魏而興，進一步加深了孫吳的危機感，迫使孫皓不得不回頭向天借力，假造神符、誣矯天命，企圖製造出自己才是天下真主的幻象。再則，孫吳政權的法統性在三國之中本就最顯薄弱，它既不能如系出皇裔的蜀漢般以漢朝宗室的血嗣為號召，又無法像立足中原的曹魏那樣挾舊漢的政治文化中心自重，最終惟有訴諸符瑞來迷惑世人。  
然而孫吳法統薄弱的缺陷卻意外造就了天璽二碑這兩朵碑刻史上的

奇葩。兩碑均為「篆兼隸體」，是以隸書方折頓挫之筆來寫具有周秦古意的篆籀字，遂成一非驢非馬的變體。有人說這種字體似源自漢代符印上的「繆篆」，而碑銘施用此體者倒不見，公元一七年的《祀三公山碑》及同刻於一二三年的《少室石闕銘》和《啓母石闕銘》（圖七）等是少數遺例。不管天璽二碑的書風來歷為何，其復古求奇的意圖十分明顯。其中《天發神識》的用筆更是奇險，豎畫收尾多呈尖錐狀，似「懸針倒

隸，常因體勢方整平穩、用筆趨於格套而被認為缺乏天趣，但也因結字端莊整飭、波磔方棱如斬釘截鐵，頗能與廟堂重地、國家大典的肅穆森嚴氣象相呼應。更重要的是，當曹魏採用這種書體來鐫刻開國紀念碑時，它也同時宣示了自己與漢朝東京正統遺緒的傳承關係。  
不論是蕭規曹隨、中規中矩的繁城二碑，還是突發奇想、故作神秘的

天璽二碑，在兩者迥異的視覺風格背後，卻同樣透露了當時造碑者對自身政權合法性的集體焦慮。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此段文字因鐫於碑陰，往往為拓碑者遺漏，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拓本亦缺碑陰銘文。

參考資料

- 〔清〕褚峻，牛運震，《金石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台南：莊嚴，1996。
- 渡邊義浩，〈「魏公卿上尊號奏」にみる漢魏革命の正統性〉，《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43（2004），頁55-78。
- 鍾肇鵬，《識緯論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 魏斌，〈孫吳年號與符瑞問題〉，《漢學研究》，27卷1期（2009），頁31-55。



圖八 天發神識碑圖（上） 禪國山碑圖（下） 引自清褚峻，《金石圖》



圖九 上尊號碑圖 引自清褚峻，《金石圖》